

陈丹燕著

海

派

女

作

家

文

丛

遥远地方 的音乐声

我特别喜欢看人。
看那些眼睛那些脸，
它们是通往一个人心
灵的窗子，而人的心
灵，是多么丰富的世
界。对于我们来说，别人的心灵和
别人心灵中心的故事，是来自遥远
地方的音乐声。

文匯出版社

海

派

女

作

家

文

丛

遥远地方的音乐声



陈丹燕著

 文 匯 出 版 社

责任编辑:奚迪华 叶义辉

封面装帧:周夏萍

· 海派女作家文丛 ·

遥远地方的音乐声

陈丹燕著

文匯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市虎丘路 50 号 邮政编码 200002)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复旦大学印刷厂印刷

1996 年 10 月第 1 版

开本:850×1168 1/32

1996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字数:148,000

印数:1—6000

印张:7.5

ISBN7-80531-402-0/I·23

定价:11.00 元

目 录

一、中国人的微笑	(1)
二、芭芭拉·王	(10)
三、瑞纳·韦伯	(24)
四、海伦·福勒	(41)
五、陈海蓝	(53)
六、袁筱一	(65)
七、李苏友	(75)
八、旧货店	(93)
九、玛丽亚	(115)
十、科拉克夫方场上的月亮	(124)
十一、谜一样的姑妈	(143)
十二、美丽的女人翠西	(147)
十三、天空真蓝	(152)
十四、走在大街的女子	(156)
十五、穿裤子的女人	(164)
十六、混乱的生机	(187)
十七、公主的微笑	(203)

十八、戴绿礼帽的女人	(207)
十九、我的手风琴伙伴	(216)
二十、梅家传人梅葆玖	(226)
跋	(237)

中国人的微笑

第二次到柏林，我就住在王先生的书房里。躺在床垫上伸平四肢时，借着鱼缸的蓝色光线，我看到王先生的书架，由于我的躺下而变得更加高大起来，那上面有成排成排的中国古书，线装书。书架边的地上靠着他的遗像，宽宽的脸，金丝边眼镜，还有脸上的一成不变的微笑，乍看上去，是稳定、安适和尘埃落定般的微笑。

果然在像上也是这样的微笑啊。我想起六月的时候，我在上海收到他的讣告和追悼文时的情形，当我明白王先生去世的时候，正站在后院的唯一一棵巨大的树下，我心头浮起的，就是这样一张笑脸，还有我在德国的房东艾尔太太的问话：“你说中国人为什么要不停地笑呢？好像你们生活在一种十全十美生活之中。”王先生的这张笑脸浮现在讣文的黑色德文字里，渐渐的，我感到心痛，心痛的感觉一层一层地积聚在身体的深处，我想，我七月到柏林的时候，一定要给王先生的墓去磕一个纯粹中国式的头。

认识王先生，是在我第一次到德国的春天，我到他家

去作客，他和太太留我在他家里吃饭，他说：“我们会给你吃你最需要的东西，鱼头豆腐，油饭，用中国碗和中国筷子。”

那时我已经习惯了吃西方食物果腹，已经感到它的方便和营养，已经不太想念中国食物了，因为住在艾尔家，我不合适用德国人的厨房做中国餐吃，我就断了中国餐的念头。那天我吃了顿足足的早饭，然后到王先生家，他家的门口，用新陶烧了一个 Wang 的姓氏牌。等坐在他家的餐桌上，用白底蓝边的景德镇小碗盛一碗鱼和豆腐汤时，我才发现，原来在德国的所有日子里，我只是不饿，而从来没有饱过。饱，原来是一个包括心理满足在内的感觉。

我看看正在饭碗后面关注地望着我的王先生，说：“我饱啦。”

他点点筷子，说：“多吃多吃，在这里就像到家里一样。”

那天，我知道王先生来自台湾。

当他还是个非常年轻的学生的時候，国民党初到台湾，高雄爆发了农民反政府的暴动，他参加到了反政府的暴动中去，后来国民党镇压了农民和学生，王先生受到政府的迫害而远走德国，当时以为是避一避风头，会在几年之后学成回国，但却一去几十年，最后只是把他的骨灰运回到台湾去。

到柏林的第一天，我问王先生的太太芭芭拉，是不是可以到王先生的墓地上去看看他。那是个黄昏，我和芭芭拉坐在厨房的窗前，我和她都坐在去年的老位置上，我们

的中央放着茶壶和茶碗，芭芭拉仍旧为我准备中国饭菜。只是我们中间的这个座位空了，那是去年王先生嘱咐我多吃的时候坐的。

芭芭拉说：“没有墓地。阿田他曾经说过，如果他去世，想把他的骨灰运回台湾，放在他母亲的身边。”她耸了耸肩，“我就把他送回到台湾去了。我想，那是他的愿望，他想回家去。”

那个下午，芭芭拉不停地说着阿田，有时候说着说着，兴高采烈地，突然就满眼的泪水，“阿田本来说要一年回大陆两次，阿田本来计划退休之后和我一起翻译中国作品到德国来的，阿田的书房还没有整理，现在我还没有能力去整理他的东西，阿田，阿田。厨房里有两个冰箱，一个是我和阿田刚搬到柏林时就买的，欢迎你住在我这里，我和阿田买了这样大一套公寓，就是欢迎朋友们来住的意思。”

我说：“你怎么不留一点点的骨灰呢，在德国可以常常去看他，也是个安慰。”

芭芭拉的眼睛在柏林夏季明朗的黄昏里变得湛蓝湛蓝的，充满了爱情。她摇了摇头，说：“不了，阿田没有说可以留在德国。”

天色渐渐地暗下来，欧洲的黄昏是我最喜欢的，长而安宁，天色微橙微灰，仿佛是一个所有紧闭的东西都可以轻易开启的时刻，心绪轻扬。芭芭拉和我们都嚼着菜，望着我们中间那个空下来的座位，那张椅子在黄昏里像一潭林中静水一样，泛出一团微光。

芭芭拉轻声说：“我们来享受黄昏的光线吧，我和阿田都非常喜欢这个时刻。”

我说好。

王先生有了芭芭拉，这个几十年与他在异乡休戚与共的太太，该是他飘泊一生中的幸运吧。芭芭拉和他在一起参加了欧洲六十年代的学生运动，和他一起办了一个用自己的教育方针养育儿童的实验幼儿园，为了获得他在德的长期居留权，离开她喜爱的莱因河畔的家乡玛堡，来到柏林，和他在一起为争取一张夏季到意大利的旅行签证伤足了脑筋。我不知道有多少德国人，愿意在自己的家乡的安定而自由的生活里加上一个麻烦的外国人，一个时时处处都可能遇到麻烦和不快，只因为你是一个外国人的人。

为了王先生，我想，应该对芭芭拉说一声谢谢，她是王先生几十年来温暖的家。

等天黑尽了以后，芭芭拉拿出他们三十年来的照相册给我看，那时候，芭芭拉是一个梳着充满六十年代欧洲小康气息的发式，有着一个普鲁士鼻子的年轻的女孩，她是王先生玛堡大学的同校生。而王先生那时，是一个长着南部人的宽脸和大而深的眼睛的严肃的青年，就像许多男子在大学的学生证上表现出来的那样，严肃，或者说严厉地望着前方，竖着一头黑发。他从来没有对我说起过他的学生时代，我想，他是个热血的理想主义的知识分子，所以他逃离了台湾之后，又会在玛堡参加欧洲的学生运动，高唱甲壳虫的歌，高呼着：“不要相信三十岁以上的人，年轻就是一切。”以致于他在玛堡有了左倾的评定而无法申

请在德的长期居住权。

为了获得在德国的长期留居，他家搬到了柏林，他进入西柏林的国家图书馆做文化研究工作，那是份安定的工作，可以养活一家人，周末可以到森林去散步，可以到游泳池去游泳，可以在家里煮中国茶吃中国餐。王先生获得了安定的生活，他说了一口好德文，也可以选择过一个德国人的生活，他为德国图书馆，安安静静地工作了三十年，直到突然去世。

在平静的生活里，他的黑眼睛、黑头发，在别人的目光里仍旧是个外国人。他为图书馆工作了三十年，但从来没有得到过与德国同事平等的机会和报酬，对待这个外国雇员，图书馆是客气而冷淡的，那些灰蓝色的眼睛望着你的时候，和你隔了千山万水，你会突然觉得，这里繁花似锦的一切，原来事不关己。

王先生从来没有对我说起过这种心情。我问芭芭拉，是否会把王先生的藏书送一部分给他工作了三十年的国家图书馆的时候，芭芭拉断然说：“不，阿田不会想送给他们。”

王先生只是反复地说，他真想为大陆需要帮忙的年轻学者做点什么。他的眼睛在镜片后面恳切地望着我，大大的，温柔的中国南部人的眼睛，他说：“中国如果好起来，像1979年以后的那一段时间，这里的华侨，心里会多么高兴。”

我突然想起了一件事，一个在慕尼黑的朋友，说了一口流利的美式英文，在西门子工作，常常用公司的钱打出

租车子。有一次，他欢快地对我说：“司机在车上说，你这么有钱，一定是台湾人。”他看看自己在圣母广场百货店买的欧洲名牌裤和鞋，说，“其实还真看不出我是大陆来的呢，你说是不是。”

我说：“是你个头。”

他说：“好啦，一起去喝啤酒，享受欧洲人的生活。”

于是，我们一起去喝啤酒，雷诺阿画过这啤酒花园，阳光、菩提树和加了柠檬汁的巴伐利亚啤酒，真的可以享受那闲适安宁的生活。

如果你仅仅想过一种为肉体而过的生活。

那一天和王先生、芭芭拉坐在厨房的桌前聊着天，一直到黄昏时分，初夏的黄昏，厨房窗前有着清澈而柔和的天光，窗台上，芭芭拉买来的望日莲像凡高的画里的一样卷曲怒放。王先生默默地望着它们，保养得很好的脸和淡淡的笑容里面，像天上渐次出现的黯淡的星粒一样，闪烁着星星点点的寥落。

想起来的，还是一个在德国读了七年书的朋友的话，那是在泛欧夜车里，我们一块去旅行，老是睡不着，有一搭没一搭地说话，她在黑暗里说：“最怕的就是德国人问我：‘来这里干什么？’好像我要赖在这里抢了别人的地方一样，那话等于在问：‘你为什么不回家去。’我总说读完书就回家。”

王先生这三十年，不知道被多少人问过这样的问题。

照相册里，王先生和儿子一起洗澡，王先生站在开满了鲜花的丁香树下，王先生和朋友们在一块，王先生在意

大利海边和欧洲人以同样的姿态晒太阳。他的脸渐渐变宽了，头发渐渐向后面退去，严肃的表情渐渐被一种貌似微笑的神情所代替，他的相貌越来越像一个地道的华侨，那神情与本土的中国人和本土的当地人都不同。

生活看上去，一切都没有什么可抱怨的。

第二次到柏林，我还打算从柏林到意大利去玩，意大利始终是一个我向往的国家，它的艺术，它的情歌中那坡里的大桔子，它的海，它的浪漫的黑发的人民，我一直想去那里，但是意大利领事馆总是拒绝给我签证，那个签证领事是个金发的女人，有着一张非常像意大利雕塑的美丽的脸，她说：“你是中国人，我们不能给你签证，你得到北京的意大利大使馆去申请签证。”

她说：“我爱莫能助。”

我说：“我爱这个国家，我想去看一看，并不想留在你们那地方，我有自己的祖国。”

她说：“中国人在意大利不回家，给我们带来了很大的麻烦，也许你是例外，但是你为你的同胞所累。对不起。”她把护照从桌上推给我。

我说：“这是不公平的！”

她说：“我就是把你的签证发回罗马，他们也要拒绝的。对你，我没有发签证的权力，我只可以对欧洲国家的公民发行签证。”

记得那天，是一个阳光灿烂的好天气，在那个欧洲凉夏，是难得的一个充满夏天气氛的好天气，广场咖啡座里充满了脱开晒太阳的人们，广场喷泉那儿有人在唱歌，是

从南美来的人，唱的歌里也洒满了阳光。

我从意大利使馆里走出来，握着粉红色的签证纸，那上面贴着我的相片，我慢慢地撕碎了它们。窄街上泊着一台一台车，我在一块窗玻璃上看到了自己的脸，一张微笑的脸，茫然的笑容，背着照相机，穿着汗衫，像满街的旅行者一样，这微笑像花窗帘一样美丽地遮住了在心里翻腾的伤心、惊涌和恼怒。

这就是来自礼仪之帮的中国人吧，被人伤害了以后并不咆哮，而用双手捂住自己的伤口，做出若无其事的微笑来。

我想起艾尔太太说的话来，她坐在餐室里，拨着手指上的肉刺疑惑而恼火地说：“你知道中国人为什么总是那样可爱地微笑吗？他们想靠微笑来解决一切，这样可以不要再动手去做了。我教两个中国人学德文，他们居然连复数都学不会，真让我发疯，他们说错了，只会对我笑，真让我发疯！”

我想沉下脸来，但从一台车的玻璃上，还是看到自己映照在德国夏季蔚兰天空下的，微笑但暮云飞渡的脸。

怀着一颗在衣服里奔突激荡的心，我安静地在街上走过，上车，坐下，甚至还为一个老人让过一次座。满耳灌满了血在血管里飞快地喷射的声音。这是个奇异的经历，那种愤怒是狂乱而无力的，只想远远离开这一切，再也不要看到那张美丽的脸。

我走回家，走进王先生的书房，坐在地毯上，王先生的遗像前燃着一团蜡，烛光轻轻地安详地跳跃着，仿佛一

只敦厚而透彻的眼睛。我想起来，今天是王先生每个月的忌日。王先生猝死在排球场上，正在打着球，倒下去了，已经死了。医生把它解释为心脏病突发，然而芭芭拉说他从来没有心脏病。

芭芭拉进来问我签证的情况，我说没有得到签证，我感到自己又在微笑，但却控制不住不让他出现，于是就用手去捂住半边脸。芭芭拉看看我，说：“不要紧，不要紧，我们去喝一点茶，阿田生前，不知有过多少次。”

芭芭拉·王

四十年代，芭芭拉出生在一个来自东普鲁士的，居住在德国中部的玛堡的德国家庭里，听说，那是个靠近罗曼谛克的中流莱茵河的好地方，是个美丽安静的小城。她和她家的孩子都从祖母那里继承了一个大而不尖，高而不耸的严肃的普鲁士大鼻子。这个鼻子到芭芭拉年龄渐大以后在脸上变得很突出，使得她的脸上常常都有一种严肃以致于严格的神情。

在她小时候，德国卷入第二次世界大战，战败之后，德国大地遍地破烂，德国人很穷，家里有时会不够吃，妈妈爸爸有时会发愁到哪里去找钱，小孩穿着大孩子穿下来的旧衣服，这都是芭芭拉和那一代德国人共同经历的故事。那时候芭芭拉是个别扭不过的小姑娘，她不能用别人的马桶。要不然会尿不出来。所以妈妈总很少带她出去，如果带她出去，就得同时带着她的小马桶。芭芭拉在那时就开始练习憋尿，也有憋得直打哆嗦的时候。

五十年代，芭芭拉家随着欧洲整体经济在战后的复苏

开始富裕起来，那个年代的欧洲人好容易熬过了战乱的贫穷颠沛，一砖一木地盖起了新房子，挂上了新窗帘，在街边的咖啡座里铺上了印有鲜花的桌布，多么香的咖啡，多么香的长枝玫瑰，人人在天天向上的生活中长长舒一口气，芭芭拉上学去了。在那个年纪，女孩子比男孩子成熟得早，常常是女孩子满心满心的寂寞之情。

六十年代，芭芭拉进入玛堡大学学习亚洲文明和日语。在玛堡大学，她认识了一个来自台湾的男青年，他参加了台湾高雄的暴动，农民和学生的暴动被国民党镇压下去了，他逃过追捕来到德国读书，后来，芭芭拉和这个男孩子结了婚。

六十年代在欧洲是个青年人伟大的时代，富裕的青年在欧洲大地兴起了反抗乏味的中产阶级生活、反抗传统的学生暴动。学生们上街游行，学生们和警察大打出手，学生们唱着新兴的强劲的滚石乐，唱着列侬的歌：“不要相信三十岁之上的人。”

德国的青年在那时方才知道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真相，愤怒的青年对一切都产生了怀疑。教科书、报纸和面容平淡或者严肃或者慈和的成年人，他们叫着要把真相告诉孩子，要把传统通通推翻，让孩子自由地尊严地成长。

芭芭拉就天天走在这样的游行队伍里面。时隔三十年，有一天我和芭芭拉到她的一个朋友家吃饭，朋友从西班牙度假回来，带来了口味不同的忌司和西班牙的甜薯。大家在厨房里吃着，一抬头，看到厨房的墙上贴着一张发黄的报纸，报纸上是六十年代的毛泽东，远隔千山万水，

在德国人家的墙上对我微笑。

芭芭拉笑起来：“海克和我，我们是同一时代的人。学生运动的时候，你们的毛泽东被许多欧洲青年崇拜过。在这里，在我们的心目中他是一个反传统的英雄，他的像章也有人在衣服上挂过，在柏林，还有书店专门卖他的著作。”

芭芭拉的朋友海克对毛泽东的画像挥了挥手，说：“有三十年了，他是我们的过去。”

由于学生运动中，学生们呼唤用全新的态度教育儿童，由于学生要上街游行，因此学生的孩子没有人管，由于芭芭拉有了自己的孩子，一个漂亮的黑眼睛男孩子力量，芭芭拉和朋友在一起开了一间尝试用新方法教育的幼儿园，她不相信传统的德国教育，也不相信曾经欺骗过她的教育系统了。

在她的照像本里，还留着在玛堡这幼儿园的照片，发黄的像片里有着那时欧洲灿烂的阳光。小孩在木头的滑梯上玩，小孩在院子的沙坑里造着会塌的房子，一群年轻的幻想着改良这个渐渐富裕而乏味起来的社会的大学生，壮志凌云地凝视着前方，他们穿着六十年代的衣服，芭芭拉在微笑着，她梳着顶部高耸的长发，黑白的照片上看不出她年轻时候头发的颜色。如今她和海克的头发都是灰色的了，当时她也并不认识海克，海克那时正和她的父亲因为代沟的问题闹得不可开交，后来和父亲断绝了来往。

那个时代的青年，是骄傲的青年，“年轻就是一切”，这个口号响彻着整个社会。想当初，青年们蓄着叛